

南腔北调

杭州话里有多少开封话

赵腊平



到了杭州，听当地人特别是女士说话，就像年轻时看过的越剧电影《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总有一种软绵绵的感觉，诸如才子佳人、吴侬软语、柔情万种之类的词汇，也在脑海中不断地浮现。

这杭州话吴依软语的，加上这城市水系发达，西子姑娘天生水灵，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大惊小怪了。

吴依软语虽然好听，但对外地人尤其北方人来说，要听懂还要做点功课。其实这道理也不复杂，杭州位尊浙江首府，早在春秋时，“先属越，后属吴，复属越”。五代十国，更是吴越国都，想必这吴语便是唯一畅通的官方语言了。

最近去了杭州，听一位老杭州的一番说道，对杭州有了新的领悟。

杭州话并不是清一色的“吴依软语”，而是浙江北吴语，范围略大于杭州城区，大致从笕桥至拱宸桥、古荡、北高峰、天竺山、五云山、钱塘江边。

语音结构是地道的吴语，但具有不同于浙江吴语其他方言的特点。有人考证，杭州话缺少“文白异读系统”，许多词语的用法与普通话相同，比如不说“锅子、事体、面盆”，而说“锅、事情、脸盆”。

有很多儿化音，而且自成音节，如“姑娘儿、老头儿、疯婆儿、小伢儿”，儿尾词成为一大特色。这几儿化音，在北方话中较常见。

很多杭州人的语言和生活习性，也带有北方特别是开封人的特点。就像河南人爱吃面食特别是面条，杭州人除了米饭，爱吃面条也是出了名的。

那么，杭州作为一个典型的南方城市，语言和生活习惯怎么会会有这些特点呢？

公元1127年，金国四太子兀术带兵攻破北宋首都汴梁城（今开封），俘获北宋徽钦二帝及后宫、百官。同年，宋钦宗之弟赵构逃往南方，在应天府（今南京）做了“南宋”的皇帝，史称宋高宗。接着，被金兵追击，带领宠臣汪伯彦、黄潜善等人，从应天府逃到扬州，一意享乐。

1129年（建炎三年），赵构置行宫于杭州，为行在所，升为临安府，治所在钱塘。辖

钱塘、仁和、临安、余杭、于潜、昌化、富阳、新城、盐官9县，地域与唐代大致相当。

公元1129年九月，金兵渡江南侵，宋高宗又率臣僚南逃。1130年夏，金兵撤离江南，高宗才又回到临安府，并于1138年正式将临安定为南宋的都城，建立了偏安一隅的南宋小朝廷，直到1276年被元朝攻占。

赵构为何选杭州作为都城？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杭州经过北宋150多年的发展，已成为规模很大且比较富足的城市。

北宋时，杭州为“两浙路”的路治；大观元年（1107年）升为帅府，辖钱塘、仁和、余杭、临安、于潜、昌化、富阳、新登、盐官9县，人口已达20余万户，是江南人口最多的州郡。

到南宋时，杭州进入鼎盛时期。绍兴八年（1138年）南宋定都杭州后，“城垣因而大事扩展”，分为内城和外城。内城，即皇城，方圆九里，环绕着凤凰山，北起凤山门，南达江干，西至万松岭，东抵候潮门，在皇城之内，兴建殿、堂、楼、阁，还有多处行宫及御花园。外城南路吴山，北截武林门，西连西湖，东靠钱塘江，气势宏伟。设城门13座，城外有护城河。

建都后，原北宋都城汴梁的权贵们，逐渐大量“麇集杭州”。同时，南宋在江河码头或交通要冲设接待处，专门接引安置大批西北流民。在流民南移中，官吏、士人、商贾、工匠、僧道、艺人等大批北方人进入临安，使“人烟稠密，户口蕃盛”。

20余年间，累计接引300万人次。到咸淳年间（1265—1274），包括所属县城，居民增至124万余人。另有史料认为，临安人口规模已达150万人，就府城所在的钱塘、仁和两县而言，人口也达43万余人。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初见临安府……西北人以驻骅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另有文章称，“西方最繁华的城市威尼斯也只有十万人口。今天的世界各大都会，当时还沉浸在一片蒙昧的幽暗之中，只有杭州的南宋皇城，灯火映彻碧空，映亮了世界的东方。”

人口的增多，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

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临安手工作坊林立，生产各种日用商品，尤其丝织业的织造技艺精良，能产出许多精巧名贵的丝织品，在全国享有盛名。

据《武林旧事》等书记载，南宋时的杭州商业有440行，各种交易甚盛，万物所聚，应有尽有。对外贸易相当发达，有日本、高丽、波斯、大食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之有使节往来和贸易关系，朝廷专设“市舶司”以主其事。

西湖风景区经过修葺，更加妩媚动人，吸引了中外游客；酒肆茶楼，艺场教坊，驿站旅舍及夜市也很兴盛。“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南宋都市经济的繁荣，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居世界前列。

南宋时，杭州还是全国的文化中心，设立了最高学府——太学，还有武学、医学、算学、史学等各科学校，临安府学及钱塘、仁和两县学的学生近千人。这里书铺林立，刻印书籍精良。绘画艺术甚盛，“西湖十景”就是由南宋画院题名的。

这里要说到外来语言特别是开封话对杭州话的影响，在南宋以前，杭州城里的人口结构与江南其他地方差不多，都是由本地人与外来移民构成。而移民不是很多，且陆续迁入，即使方言不同，对本地影响也不会很大。东晋和南朝期间，唐朝安史之乱以后，江南地区都有大批北方移民迁入，使江南的方言增加了不少北方话的成分，但杭州的移民状况与周围地区并没有明显区别，对方言的影响也没有什么差异。

开封话对杭州话产生重大影响，是在靖康二年（1127年）即北宋覆灭，南宋在杭州建都之后，“黄河流域的人口大量南迁，一次次的移民浪潮一直延续到南宋末年。”

自绍兴元年（1131年）起，临安（今杭州）一直是南宋的“行在所”即临时首都，此后的143年间都是南方的政治中心。因此，从北宋都城开封南迁的皇室和部分皇族、文武官员、商人、士人、市民、士兵、僧尼，大多集中在临安。

由于这批移民身份特殊，数量较多，居住集中，定居杭州后依然说开封话，在杭州城内形成了开封方言区。来自北方其他地区的移民，方言与杭州话有很大不同，却与开封话接近，自然会选择向开封话靠拢。

开封话成为朝廷官话，也成为杭州的强势语言；而杭州土著为与这些处于统治地位的开封人打交道，要做官、上学、经商、当仆佣，也只能学说开封话。久而久之，开封话成为杭州一带的方言，完全取代了原来的方言。

当然，在此过程中，移民或多或少受到本地方言的影响，新形成的“杭州开封话”与原来的开封话也有差异。“南方的腔调，北方的字眼，一来一去，相互融合，就成了现在的杭州话。”

南宋灭亡后，杭州失去了首都和南方政治中心的地位，但经过100多年，“杭州开封话”已经成为杭州人的母语；而且元朝以来，杭州一直是省级政治中心，经济文化发达，杭州人对周围地区继续保持着优越感，杭州话也是一种相对强势的方言。

由于元明清三代的首都一直在北方，北方话是“官话”，带点北方味的杭州话因接近北方官话而保持着身价，更有利于它的延续。

人们怎样看待杭州话现象？宋代路德

章《盱眙旅舍》：“浙近中原语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明代陈全之《蓬窗目录》载：“杭州类汴人种族，自南渡时，至者故多汴音。”另一位明代人郎瑛，也注意到了杭州方言这一特点。他在《七修类稿》中指出：“（杭州）城中语音好于他处，盖初皆汴人，扈宋南渡，遂家焉，故至今与汴音颇相似。”

清代毛先舒《与婿徐华徵书》：“汴为中州，得音之正。杭多汴人，随宋室南渡，故杭皆正音。”看来，明代的杭州方言，比今天更接近北方的开封话，而且，时人对语言的融合多持赞许态度。身为杭州人的郎瑛，更是为杭州话接近开封话而颇感自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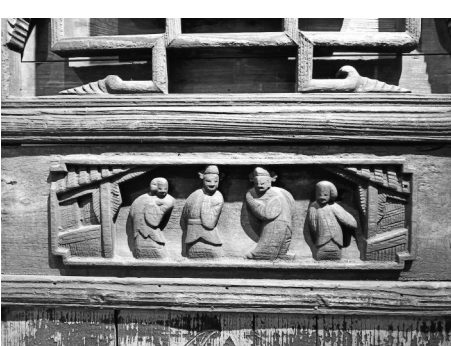
当然，我们不能否定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地方人的定位，是与当地兴衰有关的。河南长期处于“天下之中”，农业发达，商贾云集，洛阳、开封拥有首都或陪都地位之时，外地人自然会以成为河南人为荣，不会也不敢歧视河南人。即便是北宋兵败如山倒，但当时随宋室南迁的河南人也大多是皇族、高官、名流，到了首都临安（今杭州），其地位也是举足轻重，谁又敢怠慢。

但近代以来，河南常与天灾人祸、“水旱蝗汤”连在一起，河南人的优点才被慢慢遮蔽。故而，似乎与古人的包容不太一样，当今一些人对杭州话包含北方元素，表示出某种情绪。

有文章这样描述：“由于怀念在首都开封的辉煌岁月，这些来自北方的统治者（指开封在浙江以北）于是按照开封的样子建设杭州，于是当时的杭州俨然成了一座北方化的城市。河南话与绍兴土语（当时杭州通用正统的越方言）经过千年的混乱杂陈，杭州话也因此带有浓重的北方味道，是长江三角洲唯一具有北方口音的城市。”

其实，开封话影响的不仅仅是杭州话，“北宋南渡对南方的影响很大，全国各地很多方言都受到了影响。”也有观点认为，说杭州话是开封话和越人绍兴话的结合并不一定有道理，事实上，杭州话更像是元朝官话和越人绍兴话的结合。因为杭州人大多是南方越人后代，也有些是北方官宦甚至是蒙古人的后代。

■成岳 摄影



中国传统绘画，是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和哲学基础之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的图式、造型和色彩等元素，在深深打上传统文化和哲学烙印的同时，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了解传统文化和哲学背景，是我们深刻领悟传统绘画的基础。

传统绘画的内在精神

傅抱石说：“中国绘画是中国民族精神的最大表白，也是中国哲学思想最亲切的某种样式。”传统绘画在发展和演变中，如果与文化哲学脱离关系，就会失去根基，索然无味。

春秋战国时期，是以儒道为代表的传统哲学奠基时期。儒家思想主要以孔子为代表，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道德伦理和绘画的教化功能性。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说：“夫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这充分肯定了绘画的教化作用。道家思想又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老子的自然观作为审美的最高理想，对中国传统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道德经》有“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思想，认为混沌状态中的宇宙所生发出的“声”和“形”不是物理状态下所指的“声”和“形”，而是一种超然的审美境界。

庄子发展了老子的自然观，提出顺其自然、由技进道的“游心”说，其“得意忘言”“言不尽意”等思想，引向大美不言的境界。魏晋时期以《老子》《庄子》《周易》“三玄”为阐释对象的玄学，成为这个时代美学与艺术的哲学基础。玄学清谈中的“言”“象”“意”之辩，逐渐成为古代美学的核心范畴。由此可见，至魏晋时期，绘画真正步入了自觉时代，表现出对绘画审美的超然追求。

传统绘画与画论互为依存。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笔补造化乃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是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基础上形成特有的文化关怀，是画家以诗意情怀去体悟自然的结果——认为人与自然本为一体。传统绘画所呈现的美感，同样是从“天人合一”的生命律动中获得，其特征来自心灵与物象的完美融合，是画家之心赋予物象以灵气和韵律，以皴擦点染等技法形式加以呈现。

王微《叙画》所说“曲以为嵩高，趣以为方丈。以反之画，齐乎太华；枉之点，表夫隆准。肩额颊辅，若晏笑兮……”是指将书法的笔法引入绘画，提出“曲”“趣”“反”“点”4种用笔方法，具有荡气回肠的审美感发力。

传统绘画以线状的运转传达万物的生命体态，以回环曲折、开合收放、疾徐浓淡等节奏变化，来表现绘画的生命气象。

外来文化在汉文化演进中，逐渐融进传统绘画的血脉，尤其是佛教与绘画的完美融合。盛行于魏晋时期的佛教在玄学理论的基础上，对“境”和“境界”做了较为系统和深入的阐述，为绘画“意境”说的产生提供了思想基础。

佛教对“心”和“境”的论述，与绘画所传达的境界相契合。譬如魏晋山水画，由山川的客观美到山水画的主观美，归根结底是与这一时期以般若佛学这一社会主流意识的盛行有着紧密关系。

当谈论魏晋山水诗时，自然会谈到谢灵运佛学修养；谈到魏晋山水画，就会谈到宗炳作为佛僧这一事实。晋代王羲之重视书法“禅意”的表达，这与他对佛学参悟和修持本心是分不开的。因此，佛教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传统绘画的影响广泛而深远。

传统绘画的色彩关系

传统绘画的色彩与造型有机结合、相得益彰。以古代山水画为例，水墨、浅绛或青绿等各类创作手法，不是对万物色彩的简单再现，而是在追求圣贤之道基础上认识宇宙万物的本质，呈现的是“天理”和“大道”。

传统绘画的用色，既顺从“天人感应”“随类赋彩”，又要统一色彩的主观感受和客观实质。潘天寿说：“色凭目显，无色即无色也；色为目赏，不为目赏，亦无色也。”其内涵就是色彩不仅要为绘画主体的视觉所“显”，而且要为绘画主体的视觉所“赏”。

历代画家多参禅悟道，作画崇尚墨色。这并不意味着排斥绘画的色彩属性，更不是将墨与色互为对立。水墨画之所以能够成为传统主脉，是因它根植于深厚的传统文化。

清代张式说：“右承谓画以水墨画成，能肇自然之性。黑为阴，白为阳，阴阳交构，自成造化之功。故着色画亦以水墨画定，然后设色。”是指天下万事万物的两极之间，存在着有无互补、虚实相生的关系。“知白守黑”后被引入画理，形成“黑白”互为转换的绘画法则，构成虚实相生的内在关系，“黑白”与“虚实”就成为两个相对应的概念。

将黑白与虚实的概念范畴扩大，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疏密、轻重、浓淡、大小等。传统绘画的设色在丰富中求统一，在对比中求和谐。清代方薰认为：“设色不以浓淡为难，难于设色相和，和则神气生动……”这种“神气生动”的色彩的“和”，不仅依靠用一主色以调和，还要依靠用一类色相浑融。

传统绘画的用色，蕴含于三教合一的哲学精神之中。从盛唐以王维为代表的水墨画，到北宋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画，水墨写意画逐渐成为传统绘画的主脉。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是故运墨而五色具，谓之得意；意在五色，则物象乖矣。”被认为是中国绘画史上最早阐释墨色绘画功能的理论。在道家思想中“墨色”即为“玄色”，是一种符合传统人文精神的“色彩”。

道家有“墨分五色”之说，“五色”是万物的归合，是画家对自然界的感应和归纳，墨色则是万物进入绘画的归本和载体。《周礼》中说：“东方谓之青，南方谓之赤，西方谓之白，北方谓之黑，天谓之玄，地谓之黄。”

可见，这些呈现于视觉的“彩”，是古代文人对色彩的深刻领会——它不是指某种具体物象的色彩，而是文化背景涵盖下的“色彩”。因此，传统绘画所展现的色彩是潜藏着人文精神、哲学观念的“色彩”。

中国传统绘画是传统文化和哲学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两者交相辉映，浑然一体。历代绘画在风格演变中，始终彰显着它独特的生命力——对传统文化的赓续和担当，对自然山川的“吟咏”和“歌唱”。传统绘画的图式、造型和色彩等“意象”，表达方式是在深厚的文化哲学背景下产生的，这种思维方式反之又通过绘画本身加以呈现。中国传统绘画的精神，即是传统文化和哲学在绘画中的高度体现。

丹青雅韵

传统绘画的精神与色彩

李国涛



颜真卿不仅是书法大家，也是政坛翘楚。其书法与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其官节却可独擅颜公筋骨。

颜公入仕，曾任监察御史，职位高至光禄大夫；当过御史，敢言敢怒，不怕他官大压人。宰相元载，对上拍马功夫一流，对下骑马威风二流子。对上则拍，对下则骑，这般人十之九是这德性。

那次代宗“车驾自陕将还，真卿请皇帝先谒五陵、九庙而后还宫。”路经祖坟不烧纸，数典忘祖啊。元载却不给皇帝建议，既然皇帝没这想法，他才不逆圣意呢。“公所见虽美，其如不合事宜何？”元载活络，颜公一脸怒色。诸位仔细瞧，对宰相发怒的不是皇帝，而是御史。下属对上级发脾气，您见过吗？但这不是脾气，是节气也。

敢向宰相发脾气，这官还要不要了？而这颜公，脾气可以不要，官职可以不要，节气却是必须要的。宰相面前想要保官，必无脾气，而若无脾气，必无节气。颜公向元氏发了脾气，“载深衔之”。古时跟上峰吵一次架，误一生前途。“旋改检校刑部尚书知省事”，颜公为一次顶撞宰相，付出了降职降级的代价。

传奇

怕活埋就不是颜真卿

刘诚龙

教训大如许，颜公你就改了吧，脾气改，节气改，一改老天天空不会高，一改官场场域自会宽。而这颜公，天可改，地可换，节却不可改，又却不可换。

颜公在大唐官场，曾与5任宰相共过事。这些宰相肚里都不能撑船，颜公偏要去宰相肚里弄芭蕉扇。颜公5次遇相，4次遭贬，初心不改，气节不换，“中书舍人兼吏部侍郎崔漪带酒容入朝，谏议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肃，真卿劾之。”官场人，颜公谁都不敢得罪。

官人得罪法，我就得罪他。颜公不是为气而得罪人，是为法而得罪官。为了法，什么官他都不敢得罪。杨国忠的小舅子是皇帝，颜公也不攀附，“杨国忠怒其不附己，出为平原太守。”

比杨国忠更有来头的，颜公也敢去逆其鳞，撻其须。皇帝有子，敢违法，更善违法。“王当阙不乘马”，当面守法，背后违规；“步出木门而后乘”，大家都睁只眼闭只眼，颜公却是见不得这股对法律阳奉阴违者。“真卿进状弹之”，被皇帝骂了一顿，也不后悔。

“军国之事，知无不言。为宰相所忌，出为同州刺史，转蒲州刺史。为御史唐受所构，贬饶州刺史。旋拜升州刺史、浙江西道节度使，征为刑部尚书。李辅国矫诏迁玄宗居西宫，真卿乃首率百僚上表请问起居，辅国恶之，奏贬蓬州长史。”一贬再贬，三贬四贬，换了一般人，不是随波逐流，就是沉湎一气了；或急流勇退，或灰心丧气，跟隐士一起当农当仙。颜公非也，愈战愈勇，愈勇愈战，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将节操进行到底。

颜公一个书生，曾被武夫瞧不上眼。“安禄山逆节颇著，真卿以霖雨为托，修城浚池，阴料丁壮，储廩实，乃阳会文士，泛舟外池，

饮酒赋诗。”安禄山要叛大唐了，皇帝眼睛瞎，看不出；百官瞎眼睛，不去看；颜公心明眼亮，看出端倪来了，谁说书生是呆子？

颜公不仅有眼力，还有心力。看到安禄山要反叛，他装没事儿，一边厢厉兵秣马，做好军备，一边厢饮酒赋诗，麻痹叛敌。若说敢谏，是勇，那么善藏，便是有智，“或谗于禄山，禄山亦密侦之，以为书生不足虞也。”

安禄山反叛，所向披靡。唯独在平原郡，那个被杨国忠贬在此地的平原郡，遇到了扎硬寨打死仗的颜真卿。那个日日夜夜抱着杨贵妃不放的唐玄宗，也发感慨：“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对，二十四郡无忠臣，却有一个“朕不识颜真卿形状何如，所为得如此”的颜真卿。

颜公是金银不能买他骨气，美人也不能，职务职级高低都不能。恶贼李希烈要叛唐自立，满朝文武，一个个都做了缩头乌龟。颜公挺身而出，出入叛军虎狼之地。

叛军先是好酒好菜，佳肴佳人供着。利诱之后是威逼，是老套路了。见颜公软硬不吃，李贼来硬的了，“希烈乃使甲士十人守真卿于馆舍，掘坎于庭，云欲坑之。”活埋坑都挖好了，难道颜真卿不怕活埋？

颜公老矣，但气节不老。“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剑相与，岂不快公心事邪。”挖坑好麻烦，多此一举，一剑把我脖子给抹了，恩仇更快意吧。

颜公是书法大家，不乏惊世才艺，苟且偷生也能一字千金，诸士断不会小看，而他却不是这么自视的，他是节气高于利、高于职、高于艺、高于命。

颜公居书坛楷书第一，更是书生第一楷

模，“圣贤道在惟颜子，忠烈名存独臧卿。甘向贼庭守节死，不羞吾祖与吾兄”，更不羞书坛与书生。

- ①颜真卿像
- ②颜真卿《勤礼碑》局部

■资料图片

